

# 论藏族部落的形成与发展

安 俭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 藏族作为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 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一带, 即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等省区。本文从藏族的血缘部落、地缘部落、奴隶制部落、封建制部落的形成与发展, 全面论述了藏族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变迁。通过对藏族部落社会的分析研究, 我们可以了解到边疆少数民族在各民族共创中华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繁荣。

**关键词:** 藏族部落; 甘南藏区; 形成; 发展

**Abstract:** As an ancient minority in China, Tibetan ethnic minority mainly distributes in the area of the Qinghai - Tibet Plateau, which covers the area of Tibet, Qinghai, Sichuan, Yunnan, Gansu and other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nowadays. The paper discusses thoroughly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Tibetan society from the aspect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ethnic minority about blood-related tribe, geography-related tribe, slavery tribe and feudal tribe. We can understand the great contribution made by ethnic minority in border lan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hesion and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ibetan ethnic minority, the Tibetan region in the south of Gansu, formation,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K28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5636 (2008) 04 - 0014 - 04

## 一、藏族的血缘部落时期

藏族聚居在高原地区, 那里海拔较高, 幅员辽阔, 雪峰连绵, 山峦起伏, 风光神奇而壮美。传说藏族最初是由“神猴”和“岩魔女”结合而产生的。据史料记载, 藏族源于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羌人, 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而发展成今天的藏族。

藏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一样, 也经历了漫长的氏族部落发展阶段, “氏族起源的神话传说, 氏族部落崇拜的神祀和宗教, 部落形态下的经济文化生活, 以及部落间的交往和战争, 构成了藏族远古史的主要内容。”<sup>[1](序言 p.1)]</sup>

考古材料证明, 拉萨河谷的开发不晚于距今四千年前, 曲贡遗址发掘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王仁湘先生认为: “曲贡遗址的发掘, 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新石器晚期藏族先民所创造的农耕文化, 其发展水平大致是比较高的, 大体与同时期的黄河与长江文明同步, 并不显出有什么明显的落后。”<sup>[2]</sup>继贾兰坡、童恩正等人提出西藏高原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世界人类发祥地之一的假说后, 许多学者对石器时代西藏的远古文明进行了分析, 并指出: “在新石器时代, 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

原始部落的活动, 相反, 考古资料表明, 当时西藏高原范围内至少已存在着三大支系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住居民群体。他们是: 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居住于藏东河谷区、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并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卡若居民群体; 以曲贡文化为代表居住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为主的曲贡居民群体; 以细石器文化为代表、主要活动于藏北高原地区并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sup>[3]</sup>从上述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窥视到藏族先民的氏族部落起源和发展历程。

除考古资料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汉藏古文献资料和民间文学的神话传说来看到藏族先民原始社会的生活影子。但是关于藏族部落的远古情况, 我们看到的和掌握的资料目前还十分有限, 但就是从这些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藏族血缘部落时期的发展轨迹。

据十四世纪成书的《元统世系明鉴》记载, 藏族的祖先是猕猴与岩魔女结合, 其后子孙繁衍, 分别在今西藏各地开垦平地, 建筑城邑, 直到聂赤赞普即吐蕃王系第一代赞普(王)从天降临, 才有了君臣之分<sup>[4](p.40-43)]</sup>。虽然这种古老的传说具有浓厚的神化色彩, 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猿到人的历史发展中的真实性。另据藏史《贤者喜宴》

之《吐蕃王统》函记载,雅隆河谷一带(即今天的西藏山南泽当),最初为四部,即斯部、桐部、穆部和冬部,彼此经常发生纷争。这“四大部族所分布的情况为:第一是白耶桑·登天绳部族;第二是黑耶那·稳如铁铸磐石部族;第三是江赤·聪慧神灯部族;第四是黑扪朱·狗尾草部族。”<sup>[5](p.13)</sup>他们生活在山林河谷地带,食自然之谷物,穿树叶之衣,在森林中如同野人一样生活。这里所讲的部族,其实就是远古时期藏族先民们的氏族部落时代的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这充分说明了雅隆河流域是吐蕃民族的发祥地。

这时原始的宗教已在各部落中形成,其中包括自然、图腾、精灵和鬼神崇拜等。这种自然崇拜在雅隆河流域的部落广为流行,人们把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看作是光明的使者,雅隆部落便以“鹫提悉补野”(光明的意思)为自己部落的称谓。随着时间的推移,部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据记载出现了“玛桑九族”,各地的氏族和部落也不断出现。王尧译注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讲到,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如此应世而出<sup>①</sup>。这里所指的“王”实际是部落酋长,“家臣”则是氏族首领。《贤者喜宴》之《吐蕃王统》函中也提道,当时有十二小邦,稍后又有四十小邦。随着氏族、部落的出现和发展,为了生存,部落间的战争频繁展开。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由于战争的需要,各种原始武器相继诞生,民族成员人人佩带,成为保护部落和作战时最有效的杀伤武器,其中包括弓箭、斧头、斧钺、矛、叉、匕首、投绳索和投石器等兵器。由于各部落间这种战争的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着各部落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就迫切需要有一位杰出人物出来统一各部,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传说中自天而降的聂赤赞普,在到达雅隆河流域后,做了六牦牛部的领袖。六牦牛部就是雅隆部,只是在文献资料中不同称呼而已。当时以鹫提悉补野之位势莫敌最为崇高。可见,雅隆部落是当时最为强大的部落了。

关于聂赤赞普的神化传说,可以说是为了适应部落社会发展的需要才编造出来的。在血缘部落时期,血缘关系成了维系部落生存与发展的纽带,人们在这种血缘纽带下,接受氏族首领的管理,为了使雅隆部落这一血缘集团的后裔成为部落联盟的酋长,就有了聂赤赞普是住在天中心的六父天神之子弃端己的儿子,排行老三的神话传说。在他降临时,须弥山为之深深鞠躬致敬,树木为之快跑迎接,泉水为之上涌迎候,石头石块为之均弯腰作礼等。在聂赤赞普担任部落酋长以后,社会是优美的,人们都好像变得聪慧起来,所有的河流之上,山高土洁,地域美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种赞美恰恰说明藏族部落改造自然的能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社会发展向前迈了一大步。我们认为,对于“天神之子”的从天而降,实际是大家对这位部落酋长投的赞成票,因为血缘关系是维系部落统治的基础,为了让全体部落成员都明白,只有“天种”聂赤,才能成为统领部落的赞普这一道理。他利用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心理,使用从天而降来确立自己在部落中的统治地位,这说明父权制已在藏族部落中形

成,聂赤赞普不过是雅隆部落推举出来的一位有名望的酋长而已。

为了便于对部落的统治,聂赤赞普时代,原始本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自己敬奉本教,并建造了雍仲拉孜寺。可见原始宗教从形成之初,就进入了部落管理的上层建筑领域,成为统治、约束部落成员的精神工具。对于众多部落,聂赤赞普采用了“六忧虑”的管理办法,即偷盗、怒气、敌人、牦牛、毒和诅咒。对偷盗治罪,对怨怒施以仁慈,对敌人加以压服,对牦牛予以管束,以药除毒,消解诅咒。由此可见,赞普用宗教色彩很浓的管理手段来处理部落中全体成员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对外战争等各项事宜。

聂赤赞普以后下传六代赞普,统称为“天赤七王”。由于史料缺乏,材料不多,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到拉托托日年赞时期,据藏史记载,佛教传入此地。之后,佛教在西藏广为传播,深得各赞普的推崇,为以后藏传佛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藏族人民中间广为流传的《格萨尔王传》中,我们也能找到古代藏族部落社会处在血缘部落时期的痕迹,但是,此时的部落虽处于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但已有阶级因素存在,只是尚未形成成熟的阶级社会,但仍处在亲族部落联盟阶段。

二、藏族的地缘部落及奴隶制部落的形成发展时期

在论述藏族地缘部落时期,我们可以在《格萨尔王传》中看到,在血缘部落向地缘部落转化时期,由于岭部落在部落战争中的胜利,在“岭尔尔”这个由“敦”氏族构成的血缘共同体中,先后以联姻的方式加入了戎部落,丹玛、卡拉诸部落,果、党诸部落,以及珠、嘎德诸部落等<sup>②</sup>。这就意味着不同氏族合并而成的“岭尔尔”胞族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各氏族群之间已有通婚的事实存在。若干氏族若干部落由共同的经济、利益、方言、祖先、神祇等结合的部落联盟——“岭尔尔国”,其酋长、军事首领必须从领导氏族即穆布敦氏族,而不能从其它氏族中产生。这表明血缘氏族残余仍在地缘部落中残存。

随着财富的增多,阶级的出现,部落联盟间兼并战争的升级,吐蕃势力迅速崛起。在建立强大的吐蕃王朝和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地处西北的中国最早的游牧民族羌族的一支西羌也被纳入了吐蕃政权的管辖范围。随着吐蕃势力东扩的发展,为了管理上的需要不断编建部落,使地缘部落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早期的藏族部落为例,甘南地区的藏族地缘部落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吐蕃与羌族结合而形成的。甘肃自古就是古代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中国最早的游牧民族氏羌就诞生在这里<sup>③</sup>,与藏族部落相比,甘肃境内的西羌诸部落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母权制部落向父权制部落过渡的较早,而进入部落联盟的阶段基本上与中原社会同步发展。但是,由于临近内地,长期受中原政权势力的冲击,使部落联盟发展缓慢,特别是汉代以来实行的编户和编制军屯措施,使西羌的部落联盟势

力发展不起来,不过这并未拆散其部落的组织结构。魏晋以后,由于民族迁徙,中原逃亡羌地的人数增多,使西羌部落开始向地缘部落发展。隋唐时期,随着吐蕃势力的兴起和向东扩张,西羌被融入其中。当时吐蕃按照其本土的方式编建新部落,成员除吐蕃本土迁来者外,大多数与当地羌人结合起来,这种重新组合建立起来的部落打破了西羌各部落中原有的血缘亲族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地缘关系,西羌人此时步入到阶级社会,进入到奴隶制部落的发展时期。但是,西羌人“氏族部落的一些血缘关系的残存仍较多,它们是后来吐蕃政权崩溃后甘肃藏区社会的部落制度仍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sup>[6](p.19)</sup>

吐蕃势力的崛起与雅隆部落联盟的强大是分不开的。从“六地列”、“八代王”到“五赞王”中的最后一位酋长拉托托日年赞,其经济势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如“六地列”的第一位酋长埃肖列手下的亲信大臣拉甫果嘎创造了用双牛一天所耕土地面积做为计算耕地面积的单位,并用“颇”作为计算牲畜的单位。同时逐引小溪流汇合成灌田沟渠,在低地种植水田等。除种植、畜牧外,水利、冶炼等技术也有所发展,到拉托托日年赞之子赤年松赞时,社会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雅隆部落联盟经济的发展,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被征服的部落越来越多,很多弱小部落相继投靠,赞普对分散各地的部落按人口、地域划分为千户部落、百户部落等组织形式,设千户长、百户长等官职管理各部,赞普一职变成世袭,到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时,就着手进行统一青藏高原的兼并战争,他征服一些小邦后,曾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分赐土地、奴户和奴隶,这表明藏族部落社会已迈向了阶级的门槛,预示着吐蕃奴隶制政权即将诞生。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第32世赞普松赞干布继承赞普位,承袭父祖基业,征服苏毗、羊同等部落,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奴隶制政权。

吐蕃奴隶制政权建立初期,其性质还属于部落联盟,一切重大事情,是在各部落集议后,由部落联盟议会作最后的决定。其“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sup>[7]</sup>,正说明部落组织在奴隶社会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官吏由氏族和部落首领充任,父子世代承袭,各自治理所属部落民众。此时的部落已深深打上阶级的烙印,部落首领既是奴隶制朝廷的官员,又是地方部落的代言人,享有特权,形成吐蕃奴隶主贵族阶层。平民、奴隶的地位更加低下,统治阶级的权利无限增加。为了保护吐蕃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和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松赞干布时期还制订了法律,故“用法严整”,“能强且久”。<sup>[7]</sup>随着吐蕃奴隶制政权的发展和向外的扩张,奴隶制部落已成为社会政治组织而遍布藏区,被征服地区也以吐蕃本地部落模式编建部落,使藏区奴隶制部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三、藏族的封建制部落发展时期

在论述藏族封建制部落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族部落为依据展开论述。

甘南藏族地处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的草原地区,俗称“安多”藏区,解放前这里居住着一百多万藏族同胞,其中绝大多数从事牧业,少数从事农业,处在封建农奴社会,牧主通过雇工、服劳役、代牧、实物进贡、高利贷和经商对广大牧民进行剥削;农奴主通过劳役地租剥削农民。在这种社会形态下,部落仍为安多藏区的基本社会单位,部落制度在牧民的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甘南藏区的封建制部落形成于元朝,这与元朝的大统一是分不开的。甘南藏区的部落同样也经历了血缘部落、地缘部落的发展阶段,其奴隶制部落主要形成于吐蕃势力扩展到河西地区,发展于两宋时期。元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行省制度,元朝政府在今甘肃天水、平凉、庆阳、定西、兰州、临夏等地设置了归陕西行省管辖的巩昌等处总帅府,管辖这一带从事农牧业生产的藏族各部落,在青海黄河以南、黄河河源以东直今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地区,元朝政府设置了朵思麻路,给当地的藏族部落首领封授万户、千户等官职,使之管辖各自的部落。此后又在朵思麻路的基础上,加上河州路和一些州县,设置了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管辖当地的藏族。这是该地各部落接受历代封建王朝直接管理的开端,也是藏族各封建部落形成的开始。主要表现在:第一,藏族部落的首领要得到元朝政府的承认才算合法,部落首领的地位高低要看其所在部落实力的大小封授土司官衔,并以印信而定,首领承继也要得到元朝政府的承认才算合法,部落还要向元朝官府承担封建义务兵役、差税等。第二,在受封的土司地方政权下,各部落的活动地域基本上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各部落的组成人员也基本上固定下来,各部落不再接受外族人作为新的部落成员,这使政府对封建户口有了一定的控制。随着元朝中央政府统一全国藏区和对藏传佛教的扶植,以及在全藏区的传播,藏族的民族文化发展起来,民族气质在此时也进一步形成。第三,随着元朝统治在全国的确立,一些藏族的头面人物也登上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以巩昌府的旺古藏族官宦世家——汪氏家族最具代表性。汪世显曾跟随蒙古亲王阔端攻克成都,屡立战功,任巩昌便宜总帅,秦巩等二十余州事皆听裁决。其长子汪忠臣、次子汪德臣、三子汪直臣、四子汪良臣、五子汪翰臣、六子汪佐臣、七子汪清臣等都因跟随蒙古大军南征北战,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地方政府的军政首脑。<sup>④</sup>这充分说明藏族部落已融入封建社会中了。

明清两朝是甘南藏族部落封建农奴制的发展时期,明朝政府在甘南藏区统治是继续沿用元朝的安抚政策,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管理藏区事务,其所属朵甘行都司辖有朵甘仓塘招讨司(辖松潘迭宕之西)。另外在陕西布政使司之下设置河州、洮州、岷州等卫和千户所、百户所;在四川布政使司之下设置占藏先结族司(辖今甘南迭部山后地区)、腊匝族司(辖今甘南舟曲山后地区),从政治上加强对藏区的控制。同时还根据甘南藏区部落互不统属和藏传佛教势力强大的特点,又分封土司、土官,准其世袭;封授一批僧纲,使其辖有部



分藏族部落和领地。这是甘南藏区寺院统领部落的开始。

明末由于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南下，安多藏区一度陷入和硕特封建领主的控制下，清朝建立后，于 1724 年平定了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又将安多藏族各部纳入直接管辖范围之内，并设置了西宁办事大臣来具体管理甘青藏区事务，在各部落中广泛推行千百户制度，多封众建，建立规定了完备的管理制度，使甘南藏区部落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随着部落制度的发展，表现在形式上是政教合一的土司地方政权或寺院集团势力，其中以卓尼杨氏土司政权和夏河拉卜楞寺集团最具代表性，它们接受朝廷的封授，听从朝廷的调遣，但在内部依然实行以部落为单位的政权统治。如杨土司辖四十八旗（“旗”在藏语中为“兵翼”），拉卜楞寺拥有八大部落。到民国时期，甘南藏区部落一方面由于中央控制力的加强和保甲制度的施行，一些部落和部落集团被改土归流，部落属民成为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民户，这些部落自行消散；而在一些偏远地区和部落集团势力强大的地方，中央政府仍采取“因俗而

治”的办法，利用部落组织间接进行管理，部落依然存在。

部落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已开始走向衰落，这与我国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剧，我国游牧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也先后遭到列强的入侵，加上清政府当时内忧外患，已无暇顾及偏远牧区，使地方势力有了发展的环境。在与入侵列强的战斗中，部落组织发挥了较大作用。比如 1888 年初，英国侵略者再次进犯西藏时，驻守在隆吐山以部落为基础组成的藏族军队，虽然势单力寡，但仍以落后的装备武器——火炮枪、弓箭、抛石等，坚守阵地，长期顽强地抗击侵略者。由此可见，边疆少数民族在维护国家主权、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各民族共创中华中谱写了壮丽的历史诗篇。

注 释：

参阅王尧译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 年版的相关内容。

参见扎西东珠：《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阶段的真实写照——格萨尔 所反映的古代藏族部落社会浅析》，载《西藏研究》，1997 年第 1 期。

参见易华：《中国家马与游牧民族的起源》，载《甘肃民族研究》，1991 年第 4 期。

参见《元史》卷 155，《汪世显传》、《汪德臣传》、《汪良臣传》。

参考文献：

[1] 陈庆英主编. 中国藏族部落[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2] 王仁湘. 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J]. 西藏研究,1990,(4).

[3] 石硕. 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J]. 中国藏学,1992,(1).

[4] 萨迦·索南坚赞. 王统世系明鉴[M]. 陈庆英, 仁庆扎西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5] 五世达赖. 西藏王臣记[M]. 郭和卿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6] 洲塔. 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6.

[7] 通典(卷 190, 边防六·吐蕃).

(上接第 91 页)

[18] 刘世龙. 美日关系(1791- 2001)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9] 于群. 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 1972)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20] 刘大平.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再认识, 北方论丛[J]. 2004, (3).

[21] 赵学功. 略论尼克松政府的对日政策[J]. 历史教学, 2002, (1).

[22] 于群. 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项目初探(1951- 1960)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5).

[23] 崔丕. 美国与日本的南方领土与北方领土政策比较研究[A]. 崔丕.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4] 张杨. 美日冲绳问题与冲绳返还得以实现的原因[J]. 社会科学战线, 2004, (1).

[25] 郭培清. 福龙丸事件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3).

[26] 刘大平.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6008/1 号文件的形成[J]. 北方论丛, 2001, (5).

[27] 崔丕. 《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新论[J]. 历史研究, 2005, (1).